

回应公众关切,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

本报评论员 郭振纲

调整,疾病种类从14种增至132种。近年来,随着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的广泛应用,职业病危害因素变得更为多样、复杂,职业危害因素不断“上新”,专业人士呼吁,应适时、灵活、适度调整《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关注新职业、新职业危害因素,保障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权益。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职业病防治工作,职业病防治机构不断扩容,职业病分类目录不断扩大,职业病防治技术不断提高,职业病防治费用不断上涨,职业病患者的待遇不断提升。但是,随着新职业、新危害因素的出现,随着公众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有关扩大和更新职业病目录的呼声不断。比如,建议将一些比较突出的、影响劳动者健康较为严重的、与职业危害相关的疾病纳入职业病防治目录;呼吁重视新职业、新职业危害因素导致的职业病危害;建议在重视职业病物理、化学致病因素的同时,重视精神性致病因素等。这些呼声和建议都是对提升职业病防治质量的期许。

回应公众关切,密切关注新职业、新职业危害因素的不断“上新”,科学审视和把握职业病分类目录的更新,对于科学合理构建我

国的职业病防治体系、提高公众职业健康水平,意义重大。

回应公众关切,有利于普及职业病防治知识,打牢职业病预防的基础。目前,一些劳动者对职业病防治知识的了解不全面、不到位,对职业危害因素的担忧存在一定盲目性,有关方面应将回应公众关切与普及职业病防治知识相结合,特别是针对不同职业、不同岗位进行有针对性的知识普及,发挥职业病防治机构的专业力量,加强企业、工会、研究机构、媒体等各方力量的协调,减少公众疑虑,让劳动者对职业病危害和预防有科学、理性的认知。

回应公众关切,有利于科学规划职业病目录,确保公众期待和防治机制的动态一致。科学划分职业病分类,动态调整职业病目录,为职业病患者提供高水平的救治,在职业病防治制度体系建设中居于关键位置。从长远看,随着工业结构的调整,新业态、新岗位不断涌现,众多行业、职业的岗位技术化和智能化也在不断提升,劳动者对职业危害因素的隐匿性、滞后性、渐进性存在一定担忧,有关部门要积极回应公众的关切,将调整职业病分类和目录与职业

危害因素的变化规律相结合,将预防和治疗相结合,让劳动者对职业病防治形成合理预期,这对于提升劳动者的职业安全感,非常必要。

回应公众关切,有利于减少公众疑虑,确保职业病防治制度构成公开透明。职业病防治制度体系构成建立在对职业危害因素的科学评估基础上,它既要考虑职业危害因素的严重性、紧迫性和普遍性,又要考虑职业病防治的可行性,还要考虑工伤保险基金的承受能力等,需要一整套完整、科学的制度体系。而职业病分类和目录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有关方面应通过回应公众关切,将职业病分类目录和相关制度的形成讲明白、说清楚,让公众知悉现状和未来调整方向以及调整程序,消除认知误区,形成更广泛社会共识。

着眼于现实,职业病分类和职业病目录总会滞后于职业危害因素的变化。因此,在加大职业病防治力度、强化职业病防治制度建设的同时,积极回应公众关切,凝聚更多共识,让劳动者充分了解相关职业危害因素及防治知识,确保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十分重要且必要。

现场·我在我思

刘旭

最近,辽宁抚顺市评选出了10名第十五届“百姓雷锋”,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响水河子乡卫生院院长许帆名列其中。29年前从卫校毕业到乡里行医至今,她一直坚守在农村医疗一线,给看病买药没带钱的患者垫付医药费,还赶集后来院取暖的陌生老人做碗面,还把半新的棉皮鞋送给老人穿……今年的“百姓雷锋”还有“老潘头学雷锋志愿服务队”队长潘宝军,抚顺第一中学地理教师张廷威,抚顺市消防救援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教育科科长张涛等,他们都是当地百姓身边的人,也是践行雷锋精神的杰出代表。

提起雷锋,我们都不陌生。雷锋在抚顺市望花区牺牲至今已近60年,但雷锋精神一直在我们身边。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同志向全国人民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此后,一波又一波学习雷锋的热潮在各地掀起——工厂里有“雷锋号”班组、车站里有“雷锋”服务岗、社区有“雷锋”维修站,不少单位的前台有“雷锋”服务站……许多人做了好事不留名,仅留下一句“请叫我‘雷锋’”。可以说,雷锋精神已经浸入社会的每个角落,诸多普通人在各自岗位上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而雷锋精神为他们注入了向上、向善的力量。

作为“80后”,我也是在雷锋精神的熏陶和感召之下成长起来的。第一次“认识”雷锋是通过小学课文《过桥》——“有一天下大雨,雷锋和几个小同学一起去上学。他们走到桥边,看见河水漫过了小桥,雷锋说:‘来!我背你们过桥’……”;学校每年都会组织学雷锋活动,去敬老院、环卫所或交警岗亭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践行助人为乐。在我们看来,雷锋不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一种精神寄托和追求。

在经济快速发展、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价值取向趋于多元的今天,我们仍需要雷锋精神。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意见》指出,要大力弘扬雷锋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弘扬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弘扬雷锋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神,弘扬雷锋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弘扬雷锋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

如何将学雷锋活动坚持下去,将雷锋精神发扬光大?在抚顺,“百姓雷锋”的评选已有15年,他们是百姓中的一员,他们的事迹更容易让人信服,感染力更强。他们向人们传递出一个鲜明信号和价值导向:学雷锋,人人可为。在全国其他地方,对雷锋精神的宣传、弘扬,各种形式的学雷锋活动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雷锋精神通过宣传教育、通过更多的人身体力行,在代代相传。

学雷锋,任何时候都不过时,也都需要。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人对雷锋式品格的追求从未改变——热情、善良、朴素、刻苦,这股可贵的精气神一直浸润着人们的心灵,成为诸多

人面对困难、战胜困难的一种勇气和力量。评选“百姓雷锋”,让雷锋精神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激励着千千万万个“雷锋”为我们的社会,为国家发展和美好生活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让我们共同守护、传承这种精神与力量,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新征程继续发扬光大。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继续传承

打击短视频盗版要出实招见实效

笔康

短视频侵权影视作品备受诟病。近来,数百名艺人表态联合抵制短视频侵权行为。随后,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中宣部版权管理局负责人表示,要继续加大对短视频领域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坚决整治短视频平台以及自媒体、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未经授权复制、表演、传播他人影视、音乐等作品的侵权行为。(见4月26日《北京青年报》)

近年来,自媒体发展势头迅猛,有的甚至成为网络上传播影视剧的重要渠道之一,影响力与日俱增,粉丝越来越多。短视频侵权行为愈演愈烈,一方面是成本低、产量大,带来更多广告和流量;另一方面,面对短视频海量信息,监管有所滞后,不少侵权者存在“法不责众”“天塌了有个儿高的顶着”等侥幸心理。

短视频侵权现象,不仅侵犯了创作者和相关有经营资质的机构的权益,更打击、蚕食了原创精神,让文化市场上本就不足的原创精神雪上加霜——多年前,相关部门便透露,国内很多文化艺术作品创造力不够,90%的作品属于模仿和复制。如今,这样的情况仍未彻底改变。

要唤醒“装睡”的侵权者,需要权威部门的强硬声音和坚决手段。4月23日,国内超70家影视传媒机构及500余位艺人发布联合倡议书,呼吁短视频平台推进版权内容合规管理,清理未经授权的内容;4月25日,职能部门表示要加大对短视频领域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相信这些声音一旦化为行动,一定会对相关侵权行为形成更多、更大震慑,压缩一些自媒体野蛮生长的空间。

需要看到的是,部分短视频博主的作品深受粉丝喜爱,动辄点赞数十万、上百万,这体现出公众对文化产品需求旺盛,而真正有价值、有营养的文化产品相对稀缺。这也提示相关部门,治理短视频侵权行为的同时,要引导一些原创作者制作更合乎受众胃口的文化产品,也可考虑谋求影视剧等经营方与短视频博主以合法授权形式助推文化产品“出圈”,尝试合作共赢。

期待短视频时代的时与势,能够倒逼、驱动文化领域的原创力,尽快实现原创作品“增量提质”。

遏制点餐浪费 需寻求最大公约数

史洪举

点一桌子菜剩一大半、吃自助餐拿太多吃不完……这种情况商家能否收费?据新华社报道,4月26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反食品浪费法草案二审稿规定,餐饮服务经营者可以对造成明显浪费的消费者收取处理厨余垃圾的相应费用,收费标准应当明示。

人们外出就餐、请客吃饭,点餐浪费的情况也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据报道,我国仅城市餐饮每年会浪费约340亿至360亿斤粮食。这一数字让人吃惊。

节约粮食是传统美德和社会公德,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对餐桌上的铺张浪费,既要从道德层面约束,也有必要从法律层面规制。立法过程中,如何规制点餐浪费、谁来监督、是否处罚等问题,都需要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综合考量。

现实生活中,一些消费者宴请客人、朋友时,倾向于多点餐以示热情。很多商家也不愿得罪消费者,且基于收益考虑,未必会真诚劝导消费者少点餐,不少商家还可能推出一些优惠套餐以达到促销目的。也就是说,与消费者接触最多、最能直观监督消费者用餐行为的商家,很可能配合监督的意愿不足。

同时,对用餐浪费现象是给予行政处罚还是由商家向消费者收取额外费用,对于不愿意配合的商家或故意诱导过度消费的商家,是否应给予处罚,值得斟酌。遏制点餐浪费需要统筹各方意见,需要寻求最大公约数。

比如还是要多用经济调节的方式鼓励节约,反对浪费。对于存在浪费现象的消费者,可由经营者向其收取厨余垃圾处理费等费用,或者事先收取一定的押金,不存在浪费现象的,予以退还,或者以积分、返现等方式奖励节约、光盘的消费者。现实中,一些餐饮企业已经在推行类似举措。对于纵容或者怂恿消费者浪费的经营者,可以考虑给予行政处罚。

当然,用餐浪费与否一定程度上属于消费理念和生活习惯问题。对此,有必要通过网络等载体,通过在经营场所等发布公益广告等方式,强化宣传和教育引导力度,让更多人树立节约理念进而成为更多人的自觉行动。

独立机构监督能否让个人信息更安全?

冯海宁

据新华社报道,4月26日,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审议。该草案中拟规定,提供基础性互联网平台服务、用户数量巨大、业务类型复杂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成立主要由外部成员组成的独立机构,对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进行监督,并要求其定期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社会责任报告等。

我国目前已有多部法律法规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内容,但呈现碎片化特征,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层面仍缺少“拳头”武器。为此,舆论多次呼吁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去年10月,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如今提请二次审议,距离该法的出台可谓又进了一步。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提交审议的草案,拟强化互联网平台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提

供基础性互联网平台服务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成立独立机构,履行监督义务。这种治理创新和要求让人眼前一亮。

时下,个人信息保护主要有两重防护网,一是网络运营者或个人信息处理者,对其收集、处理的个人信息采取保护措施;二是政府有关部门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从过去个人信息被过度采集、滥用,以及由此导致的种种乱象甚至违法犯罪行为来看,现有的保护个人信息的措施在力度、强度上还有待提高,增加独立机构开展对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第三方监督,相当于多加了一道“保护墙”,其效果值得期待。

从理论上说,独立机构开展的第三方监督,既能倒逼个人信息处理者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也能为公众、媒体监督创造有利条件,还能弥补政府部门监督的某些不足。但也应清醒认识到,这种第三方监督能否成为个人信息保护的给力“铠甲”,关键取决于其“独立性”——是真独立还是

“野鸡大学”——“中国邮电大学”像极了正规高校北京邮电大学。其次,一些运行“野鸡大学”的非法组织和人员会将自己冒牌的官网服务器放到国外,以逃避监管,即便事后被查处,换个域名还可继续存在。再有,一些人并非不了解“野鸡大学”的真面目,而是彼此“心照不宣”,互相利用,做着金钱与学历、名号、荣誉的交易。比如,在“中国国学院”花2.7万元就可买到一张“国学使者”证书,顶着这个名头就可到处收费演讲。如果能出十几万元,还可配齐所有伪造证书,设立分支机构,自行招人。这已然是一条清晰的利益链。

面对这些骗术较高的非法社会组织,监

乔然

据《光明日报》报道,日前,北京市民政局依法对非法社会组织“中国国学院大学”及下设的“中国国学院大学国医药生命科学院”“中国国学院大学国医药生命科学院量子医学研究院”等70家分支机构予以取缔。至此,这个招摇撞骗多年的非法社会组织终于“土崩瓦解”。

显然,“中国国学院大学”是一所传说中的“野鸡大学”。据报道,该非法组织“伪装”得很好,校区、校歌、毕业证书一应俱全,对外宣称有文化部支持,在北京,天津,广东广

州、深圳,湖南长沙多地有分校。而真实情况是该校从未在相关部门注册登记,还伪造国家部委公文及登记证书,私刻印章,发布带有“中国国学院大学”的“红头文件”,并通过设立分支、举办揭牌仪式、颁奖等方式收取费用。

这些年来,“野鸡大学”似乎从未淡出公众视野。有关部门曾多次通报“野鸡大学”名录,仅2018年就取缔并公布了392所。每年高考填报志愿时,也会有不少媒体报道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野鸡大学”。

就算如此,不少人依然“中招”,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这与“野鸡大学”名字极具迷惑性有很大关系。比如,被教育部通报的